

#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

## South China Research Resource Station Newsletter

### 徽僑

王振忠

(復旦大學中國史地理研究所)

筆者手頭有晚清以來徽州商人的數百封信函及十數冊“信底”(即抄錄私人來往信函以備查閱的尺牘匯編),其中有不少都反映了鹽業、典當、茶業以及其他商業活動及社會生活的內容,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。通過對這些尺牘作比較微觀、細緻的研究,常能發現以往鮮為人知的歷史事實。

譬如,近數百年來,在“無徽不成鎮”的江南,徽州人是一個特殊的區域人群。關於這一區域人群,民間約定俗成的稱呼主要有——“徽(州)人”“徽商”、“徽賈”、“徽州朝奉”、“徽州算盤”、“徽駱駝”以及“徽狗”等<sup>1</sup>,但“徽僑”的稱呼,卻從未見諸記載。而在筆者收藏的尺牘中,有四十七張信封(其中大多附有信紙)<sup>2</sup>則提供了這方面的訊息。信是民國十二年(1922年)至民國十八年(1929)前後,飄泊異地的歙縣人吳錦山寄往家鄉——徽州歙南余坑,<sup>3</sup>由當地的“吳德大寶號”(一商店名)托轉斜干橋、田干<sup>4</sup>、鴻飛<sup>5</sup>。收信者是其岳母方松廣(“廣”當為“慶”的簡寫)、妻子方氏、內弟方炳喜,還有的是由“岳母老大人方氏”轉交給兒子吳鴻生的。其中的一封這樣寫道:

岳母老大人尊前,謹啟者:婿在里拜別以來廿六日。由深渡刀(引者按:即“初”字)一日開船,刀(初)七日到杭,婿初八日動身,由上海往蘇各埠辦事,十五日返杭,本當早以回音,因為事體婿太多,故而今日來字通告,婿在外身體平安,可為(?)放心可也。

大人在府上諸事清吉!

子婿吳錦山拜。

據吳錦山給岳母的另一封信上稱:他曾在湖州鐵床廠、諸縣(諸暨縣?)公安局及寧波、慈溪等地的警界工作,後來“想想警界辦事,也是不美,調來調去”,於是就告退進入商界,“東謀西就”,到江蘇震澤東市“正豐”米行內收賬,又在浙江孝豐東街的“周裕興號”、湖州城北門外市陌路“協大號仁記”、湖州新市鐘管鎮“方義和號梅記”、新市徐家莊、長興水口“西號鹿記”、杭州江干海月橋大街的“鼎大昌行”等商號從業,並時常活躍於蘇州、上海等地。之後,他創辦了“徽僑傳達公司”。據他寫給岳母的一封信中談到:

……婿鼎大昌生意自己分手,現下婿自己招股,辦就公司,倘有回音,請寄杭州江干洋洋橋大街徽僑傳達公司內可也,……<sup>6</sup>

此時,他所用信紙,最後有“徽僑傳達公司”的印記,後來的信函則為“徽僑傳達總公司”的專用信紙(上有電話、地址)。由“公司”到“總公司”,信紙則由簡易到專用,不知這是否可以說明公司由草創到逐漸走上正軌並進而有所發展?據上揭寫給岳母及妻子的信函可知,“徽僑傳達(總)公司”是採股份式的經營方式。吳錦山在寫給妻子方氏的信中,一再提及“公司開張,定就章程”的艱難:

……愚現下發生公司以來，用場太大，五月鼎大昌出行以來，辦事到至今，茶錢事費、香費，用去五十六元，東來西去，辦（事？）非錢不行。……

……近日以來，咳病又發了，不能安身。愚發生開辦之事以來數月，心血去了不少，做人之道，實在為艱！愚心高命不高。……

……愚咳病復法（發）以來不止，每日愚也要辦事，好不苦楚。你在家當愚在外小（愜？）意快樂，愚反而比吃別人家飯之苦。愚在別家行內生意，反而快樂。現下發辦後，反而身體不能行動。愚倘在外事，心記念在本公司之事。現下一千擔，愚一人單（擔）在身上。……

不過，從往返尺牘來看，他與妻子方氏分居兩地，關係似乎極其不睦，因此，所嘆苦經是否完全屬實，仍然可存疑問。這一批函中，有二十二張信封封皮均作：

江干洋洋橋上首街托面交

吳鴻生小兒收

杭州徽僑傳達總公司緘吳。

而其中的信紙，則多作：“徽僑傳達公司轉運過塘 / 電話南字一百八十六號 /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第 頁 / 杭州江干洋洋橋上首（或江干美政橋上首街）”。“美政橋”在今杭州江干區復興街，位於錢塘江北岸。<sup>7</sup>“江干”即江岸之意。據光緒《杭州府志》卷六《市鎮》記載：

錢塘縣浙江省，在鳳山門外。官舟估客，自閩、粵、江右來者道衢州，自新安來者道嚴州。江干上下，帆檣蟻附，廛肆櫛比。

上述引文所指的是道光、咸豐之前的情況。民國年間，徽商“寄萍生自用氏”所作的《自助錄》<sup>8</sup>中，有《甲秋日枯坐無聊，有感千里依人之慨，而書於滬南萍寓》詩，描摹了從徽州經新安江至杭、滬一帶的沿途所見及心理感受，其中一句作：

遠望杭城已在前，江干攏岸出徽船，提攜行囊投過棧，發挑搬運步杭垣。

上揭幾種資料，都提及“江干”這一地名。至遲自明清以還，杭州就是徽商麇集鱗聚之區。<sup>9</sup>乾隆《杭州府志》卷五《市鎮》錢塘縣“湖州市”條下載：

湖州貨物所萃處，其市即以“湖州”名。猶錢塘江濱徽商登岸之所，即謂之“徽州塘”也。

據此，則“徽州塘”的地點，應當也就在江干一帶。筆者在歙縣收集到的一份資料，就有如下的內容：

信吹葭琯，瑞獻桃符，隨寅斗以遙瞻，  
晉辛盤而稱賀。恭維

益泰寶號，履端兆慶，

鼎祉凝麻。

商戰正酣，物備東西異品；

利權獨握，名馳南北通衢。法羅伯氏之  
自由貿易

既彰，夫公道與地格，良為平等信義，  
實樹之先

聲。翹企

鴻獻彌殷，雀忭，小號情深燕賀。阻鳧  
趨，思御

李以登龍；踵門未逮，藉頌椒而寄鯉。

心版先馳，爰

肅寸柬，恭賀

春禧，統希惠照不宣。

諸翁先生，均此致賀。 名正肅

茲報酒價，今市

平酒柒元四角，膏梁正號拾元捌角

歸平蘇禿捌元〇角，膏梁副號玖元六角

如欲添配，格外歡迎，特此通告，并請

寶號

諸翁先生照 月五路日 江干德源膏梁燒  
酒批發所。<sup>10</sup>（附件一）

“五路日”當指正月五日，此一時間標識，頗具商業色彩。<sup>11</sup>根據上述的文字推測，這應當是一份由位於杭州江干的“德源膏（高）梁燒酒批

發所”，於正月五日給歙縣“益泰”商號的新春賀柬，並附有酒價行情。<sup>12</sup>賀柬顯然反映了徽州本土與杭州江干一帶的經濟聯繫。

從傳統的交通路綫來看，清人憺漪子選輯的《天下路程圖引》卷一“徽州府由嚴州至杭州水路程”，有《水程捷要歌》，曰：

一自漁梁壩，百里至街口。  
八十淳安縣，茶園六十有。  
九十嚴州府，釣臺桐廬守。  
撞梓關富陽，三浙江口，  
徽郡至杭州，水程六百走，<sup>13</sup>

從徽州到杭州的路程，其起點是歙縣的漁梁壩。信紙上的“過塘”，當即“運輸過塘”之意。從方志上看，杭州的“徽州塘”，是“錢塘江濱徽商登岸之所”；而歙縣的漁梁壩，則是練江（新安江北條主要支流，新安江為錢塘江的主流）畔徽商的登岸之所。據東南大學建築系的調查，漁梁街沿街建築絕大部分是由各種店鋪組成，在他們統計調查的街段上的101戶中，屬於店鋪等商業服務類性質的有95戶，佔96.7%。迄今，漁梁老街上仍有二家當年“運輸過塘行”的遺迹。如漁梁街87號茶葉店，原為徽商巴道復過塘行。據說，“巴道復運輸過塘行”建於清末，“原為漁梁碼頭上一茶業周轉兼經營處。當時每有貨船過漁梁，即在此暫時存放貨包，然後再轉散到周圍地區，所以稱為過塘行”<sup>14</sup>。另據民國二十七年（1938年）吳棟池的《特殊經營》<sup>15</sup>記載：

（一）梁上每排裝十簍，至岸寺計價洋二元六角。由岸汪裕源過塘至漁梁

（一）岸寺由駁般至漁梁所裝十簍，計價洋八角

（一）中茶簍每只六角四分 重約七斤  
正泰隆蘭溪過塘行

……

（一）杭州江干余錦洲、洪大房 方正華，漁梁江張茂出身

……

上述“梁上”當即漁梁。故此，“徽僑傳達總公司”的業務，應當也是與“蘭溪過塘

行”和漁梁的“運輸過塘行”為同一性質的行業。

四十餘張信封是民國年間的遺物，發信及收信人均是普通民眾，信函鑒藏者想來對此不屑一顧。但它提供的明清社會文化史方面的訊息，卻彌足珍貴。姑且不論信中涉及的其他一些徽州民俗文化方面的內容<sup>16</sup>，僅“徽僑傳達總公司”的名稱，就頗耐人尋味。根據這些信封的揭示，如同海外有“華人”、“華商”的說法一樣，徽州人也有“徽人”、“徽商”和“徽僑”的稱呼。這或許凸顯了徽州區域人群的特色，對於我們研究徽商在僑寓地的土著化過程以及與地域社會的關係等，都提供了有趣的史料。

註釋：

1. 參見王振忠《“徽州朝奉”的俗語學考證》，《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》1996第四期。

2. 信封的尺幅規格有兩種，一種為7.7X16.5cm，另一種為8.65x18.5cm。

3. 即霞坑，位於歙縣東北部的霞坑鄉。本世紀八十年代初有188戶，808人。因村前溪河曲折似蛇，原名蛇坑，方言霞、蛇音近，後改霞坑。（參見《安徽省歙縣地名錄》，頁96，歙縣地名委員會辦公室編，內部資料，後記為1982年10月15日，1987年3月印刷）從信函封皮來看，亦寫作“余坑”。

4. 斜干、田干均位於歙縣東北部的蘇村鄉，與霞坑相近。

5. 鴻飛也歙縣東北部的霞坑鄉。

6. 同封寫給妻子方氏的信也說：“……愚鼎大昌生意自己分手，現下股東招就，開辦公司，愚現下公司辦事，回音寄杭州江干洋泮橋大街徽僑傳達公司可也。”

7. 由商務印書館於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印行的杭州市地圖中，有“洋泮橋”和“美政橋”的地名，見《近代中國都市地圖集成》（日本地圖資料編纂會編輯，柏書房，1986年5月25日），頁64。

8. 抄本，17x24.2cm，筆者收藏。書中有“寄萍生自用氏附志”，曰：“余自幼年習學商業，少讀書，不通詞韻，勞人草草，俚語陳辭，聊藉感懷，以紀其事，詞意工拙，所不計也。”

9. 筆者手頭有一張杭州“胡慶餘堂萬應靈膏”廣告(29.6x20.3cm)及一封胡克家用“休城胡開文筆墨莊用箋”(18x28.4cm)所寫成的吊唁信函(民國二十年七月二十四日),據信箋之下的地址,胡開文筆墨莊位於杭州保佑坊大街,並注有“浙省祇此一家另無分設”。

10. 尺幅26.5x38.4cm,大紅紙,上為“官上加官”的圖案。此係中國清代流行的吉祥圖案,鷄冠花中站一雄鷄,雄鷄高冠豎立,冠、官諧音,故曰“官上加官”。按:引文中的斜體字部分為毛筆字。

11. 姚福均《鑄鼎餘聞》卷四:“五路神俗稱為財神,其實即五祀門行中醫之行神,出門五路皆得財也。明姚宗儀《常熟私志》云:正月五日起五路神。(均案:今以是日為神誕)……”(轉引自宗力,劉群編著《中國民間諸神》“五路神”條,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版,頁653)賀東時間標識為“五路日”,頗具徽州民俗色彩。筆者手頭有民國二十五年(1936年)的一部《迎神簿》抄本(復印件),其中就有“迎五路”的長篇宗教科儀。“五路”也叫“五路猖神”,即徽州的五猖信仰。

12. “信吹葭琯”,是指節氣已到;“瑞獻桃符”,則指時屆新春;寅,是象正月陽氣上升萬物始蘇而動之貌;辛盤,古時元旦、立春用葱、韭等辛菜作食品,表示迎新;履端,年歷的推算始於正月朔日,叫“履端”。

13. 《天下水陸路程、天下路程圖引、客商一覽醒迷》,楊正泰校注,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版,頁361-362。

14. 見《徽州古建築叢書——漁梁》,東南大學建築系、歙縣文物管理所編著,東南大學出版社1998年8月版,頁69,頁91。

15. 抄本,版幅為15.2x19.1cm,筆者收藏。此書封面為藍布,筆者寓目的徽州帳簿多為此類,當即揚州鹽商宋迪文(歙縣上豐人)信函匯錄(原書拙藏)第四號信函所言之“藍布之簿”。與吳棟池相關的資料,另有《信札》抄本一冊(13x23.5cm),計五十三通,時間自民國三十四年(1945年)至民國“四十年”(1951年),內容叙及徽商在江浙一帶活動的豐富內容。

16. 例如,吳錦山在孝豐周裕興號從業時,在給妻子

方氏的一封信中曾說過:“……本十八日德(得)知來信,因說辦金銀袋、錫箔之事。余金銀袋十九日由局(引者按:指郵局)寄出,余杭吳德大店轉交你母代收。金銀袋一扎,內兩包,清明、七月半兩季應用。錫箔寄郵局不便,家中借用一支,但等便寄上奉還。……”清代以還,紹興、杭州等地,是江南錫箔業的中心,舊時徽州的錫箔主要來自紹興一帶。關於“金銀袋”,光緒末年歙縣南鄉蔡塢里民間刊本《鶴年家書摘錄》(13.5x23.8cm)載:“……遭亂(引者按:指太平天國時期徽州的兵燹戰亂)之後,民人亡傷七八,以致牛祀者居多,如我尹公會,置租地數斗或一擔,以作先祀祖塋添燒金銀袋之舉……”(頁36下)戊辰年何林榮訂的《木本水源》(民國抄本11x18.4cm)中第三一號,有“祀回呼與拘句人金銀包式”:

謹備金銀一包

焚化

五方勾追使者

靈位 受納

制士姓名稽首

歙縣上豐鹽商宋氏抄本《木本水源》(12.8 x 23cm),

亦經常提及清明、七月半祭祀,“清明寫紙袋起,謹具宴席儀壹封,獻……受納”,也就是所謂的“金銀袋”。另有《金銀袋簿》兩冊(14.2x24.5cm)一冊封面題為“嘉慶拾四年仲春王秀庭辦”,另一冊題作“大清道光拾貳年正月春立 / 王永鏞辦”。



